

【论文】

超级村庄变迁与农村自发城镇化实践

赵晓峰 褚庆宜

内容提要: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和城镇化稳步推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本文从内源式发展视角出发,以永联村为例,从“主体性”“开放性”“普惠性”三个维度考察了农村社区自发城镇化的具体历程,重点分析了超级村庄迈向稳态城镇化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在农村社区自发城镇化的过程中,拥有主体性的村集体发挥了重要的组织载体作用,村庄社会保持开放性是有效融合内外部资源、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党组织领导下的普惠性追求则为村庄朝着城镇化方向转型确立了目标指引。通过经济形态、社会文化、社会治理等多个层面的转型,村庄逐步突破了“城-镇-村”格局中以城镇为发展中心的“核心-边缘”梯度发展模式,农民过上了城镇化的生活,走出了一条自发城镇化的发展道路,村庄的变迁也丰富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实现形态。

关键词:超级村庄;自主性;开放性;普惠性;自发城镇化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大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和城镇化稳步推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批小城镇快速发展,推动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城镇化转型,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众多学者的推动下,小城镇和乡村工业研究成为热点。他先后发表了《小城镇 大问题》《小城镇 再探索》《小城镇 新开拓》等文

作者简介:赵晓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转型与乡村治理;褚庆宜(通讯作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研究与评估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转型与乡村治理。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研究”(22ZDA101)。

章,指出社队工业和乡镇企业是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道路,推动着一批小城镇成为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乡村经济与城镇经济相辅相成,结成一个细胞体(费孝通,1984)。这些研究直接点明了小城镇的中间衔接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以“城-镇-村”为主导模式的中国城乡社会发展梯度格局。

随后,有学者以工业经济发展较好的村庄为考察对象,发现当时中国出现了以乡村为中心的“自发城镇化”实践,乡村突破了“城-镇-村”格局中以城镇为发展中心的“核心-边缘”梯度发展模式。一些学者将这些具有新结构特征的发达村庄称为“超级村庄”(王颖,1994;折晓叶,1994)。超级村庄通过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突破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单向依附关系,并走出了以城市、行政中心为发展主导的第三条发展道路(折晓叶,2000)。折晓叶(1996)指出,超级村庄已经成为乡村中一种新的社区形态,在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上都出现了城镇化转向。同时,有研究从制度变迁视角指出,超级村庄是在国家政治文化影响下农村逆市场化的制度变迁选择(冯仕政,2007,2009)。近些年来,学界关于中国城镇化发展路径的考察,主要集中于政府行为与农民家庭再生产经营行为两大方面。有研究认为,中国城镇化转型过程中政府起到主导性作用,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金融资源三要素组成循环机制,快速推进城镇化(周飞舟、王绍琛,2015),实现中国城镇化的跨越式发展(李强等,2012);也有相关研究指出,中国的城镇化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接力式城镇化(王德福,2017),即通过代际分工践行“半工半耕”的家庭内部协作模式,推动了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的形成(夏柱智、贺雪峰,2017)。这些研究为从整体上探讨中国城镇化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视角,但是其缺乏在村庄层面的城镇化转型路径考察。本文尝试从村庄内生发展的视角反思中国乡村自发城镇化的问题,即探讨村庄如何在内生式发展的驱动下实现自发城镇化转型。

需要点明的是,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便有学者关注到超级村庄的发展动态问题,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苏南模式(费孝通,1984)、折晓叶团队所探讨的超级村庄现象(折晓叶,1994)以及温铁军团队提出的村社理性(温铁军、董筱丹,2010;温铁军等,2011)等,都考察了乡村经济起飞和转型的历程。跟踪考察这一类型村庄的发展动态,对我们研究乡村社区在经济起飞后的发展逻辑和持续观察乡村自发城镇化转型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证价

值。为此,2020年11月、2021年7月,笔者与团队成员前往江苏省永联村开展了为期近一个月的深入调研。在调研归来后,笔者亦一直保持着与永联村相关干部、群众的密切联系,持续关注着永联村的发展动态。同时,笔者还查阅了永联村村党委、村企、经济合作社的相关会议记录、年度总结报告、永联村志,以及近些年其他研究团队对于永联村的研究成果等材料,全面考察了永联村近40年的发展动态,发现永联村探索出了一条农村自发城镇化的实践路径。本文尝试以永联村为例,考察这一类有工商业经济基础支撑的超级村庄的转型变迁历程,并从中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转型经验。

二、村庄自发城镇化的实践路径考察

(一)超级村庄自发城镇化的变迁历程

费孝通(1984)指出,中国小城镇发展的关键是乡镇工业的平稳运行,通过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实现对农村相对过剩劳动力的就业吸纳,进而让小城镇成为乡村与城市之间稳态的中间结构。折晓叶、陈婴婴(2000:12、32、347、356-358)从改革的历史进程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正是由于改革开放的推进,城乡二元分立的结构开始出现变化,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强控制开始减弱,乡村才得以摆脱依附于城镇的状态并获得“自然城镇化”的机会。乡村社会“自然城镇化”是在乡村工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实现的,这是“含自然城镇化的乡村工业化”。潘维(2003)指出,中国农村迈向市场化的过程中,乡村工业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乃是在制度和思想上得益于社会主义集体运作模式的遗产。同时,有学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一定的税收占有权,地方政府可以分享地方企业发展带来的税收增长,这使得“地方法团主义”出现,进一步推动了乡村经济的起飞(Oi,1992;Walder,1995)。此外,有研究考察了村庄社会的内生发展动力,指出自古以来中国乡村社会便存在着农工相辅的传统,并认为此模式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降低农业生产“内卷化”程度的重要手段(黄宗智,2000),发展乡村工业在乡村社会始终存在强大的内生需求(费孝通,1984)。

由以上论述可知,在外部环境变革带来的制度红利和村庄社区内在发展动力的促发下,乡村经济得以起飞,且使村庄突破了“城-镇-村”的传统发展模式,向城镇化转型。在社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超级村庄通过“挂”“带”

“并”的形式链接众多村庄,并使这些村庄强依附于自身,进而以超过周边村庄乃至乡镇的发展速度,成为地方事实上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服务中心,呈现出“拟城镇化”的发展样态。本文认为,对农村社区自发城镇化转型的考察,可从产业经济结构、公共服务模式、生产生活方式、社区治理形式以及社区社会形态等维度展开。在经济层面,超级村庄工商业产值远超农业,基本实现非农化的生产实践,并成为地方专门化的生产和加工基地、工业产品加工的集散中心以及金融中心。在公共服务层面,拥有强大村集体经济支撑的村两委组织,利用村集体资金为社区提供各类公共服务,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当地乡镇政府的职能(折晓叶,2020)。在村社区生产生活方面,村民的职业和身份走向多元化,村民的生活方式和社区互动规则都发生了变化,进而逐步产生了与城市社区相似的职业结构、生活方式。在社会治理权能掌控方面,国家仍旧掌控着对各单位组织的资源分配和权力授予(李路路、李汉林,2019),超级村庄的自发城镇化发展模式受到地方政治格局的限制,其难以成为政治中心(折晓叶、陈婴婴,2000:245-265)。但是,超级村庄拥有超强的经济实力,因此能够不断地向地方政治中心渗透,并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寻求外部力量支持。这种力量打破了“城-镇-村”依次递减的行政资源分配逻辑,使其能够获得更高层次乃至中央部门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支撑。随着超级村庄的发展,其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辐射和带动能力有超过乡镇乃至县城的趋势,出现了以超级村庄为“发展极核”的自发城镇化转型形态。

(二)内源式发展视角下农村自发城镇化的实践路径

二战结束后,全球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一方面,城市社会快速发展,人口、资本等各类资源都被吸纳到城市;另一方面,落后地区的传统村落由于各类资源的外流而走向衰败,加上传统文化资源的丧失,正常生活面临失序(贺雪峰,2013;陆益龙,2017)。为了应对广大乡村社会的衰落问题,由外来企业或者委托政府对乡村地区进行开发建设的外源式发展模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选择。然而,资本在进入乡村社区后,受逐利本性驱使,其很可能会逐渐成为一股攫取乡村社会资源并加剧农村社区衰败的力量(张环宙等,2007)。

基于对外源式发展模式的反思,内源式发展理论得以形成,“以人为中

心的发展”逐渐被视为乡村发展的重要路径。20世纪70年代,瑞典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财团提出了“内源式发展”的概念,指出若将发展理解为对个体的解放和全体人类的整体性发展,发展的推动力量应该是来自社会内部的(Nerfin, 1977)。日本学者鹤见和子(1989)进一步指出,推动乡村社区的发展需针对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考虑当地的自然资源和传统文化遗产,结合外来的知识、技术、制度等方面资源,进行可持续性的开发。在社区发展的控制权研究方面,巴克(Barke, 1997)认为内源式发展可以使社区掌控发展历程的控制权、发展项目的选择权和发展收益的获取权。也有研究指出,内源式发展是农村发展的理想模式(Little & Austin, 1996)。但沃德(Ward et al., 1995)等学者则呼吁应当将内源式发展的视野扩大,超越外生与内生发展的二元对立思路,以整体性的视角推动乡村地区的发展。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 2012)指出,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乡村社区完全不借助外部资源的支持不可能实现持续发展,应当以新内源式发展理论为指导,即以社区参与和资源内生为前提,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对外部的技术资源、人才资源、物质资源等力量进行有效的吸纳和整合。

在内源式发展视角下,超级村庄获得的经济快速发展与自发城镇化转型,是其在对内外资源进行充分融合的探索中实现的。结合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环境,本文以内源式发展理论为切入口,提出“主体性-开放性-普惠性”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尝试对乡村社区自发城镇化的发展历程与演变逻辑进行深入剖析。

首先,“主体性”主要关注村庄发展“依靠谁”的问题,即村集体是推动乡村工业化发展和实现自发城镇化转型的重要组织载体。强调村集体的主体性,便是将其进行了人格化的假设(熊万胜, 2010),并将其视为社会结构中拥有自身利益诉求的理性行动者(迪马吉奥, 1988/2008)。同时,对村社主体性的强调意在指明,村庄自发城镇化的历程,并不单是外部社会力量向村庄“注入”“渗透”或“延伸”,而是村庄向大社会“进取”“参与”与“融入”(折晓叶、陈婴婴, 2000: 31)。温铁军团队以村社理性来总结村集体作为中介统合的优势,即发挥村社理性,让农村社区内部处理成员合作的交易成本,并形成组织租(温铁军、董筱丹, 2010),这与科斯(2014)和威廉姆森(2001)所言之以企业组织形式来降低交易成本的理论相似。并且,正是由于村社具有

主体性,村企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将农业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甚至以零成本获得村集体的劳动力资源和集体资金支持,进而让村企解决原始资本的积累问题(温铁军等,2011)。潘维(2003:17-18,32,43)也指出,正是由于农村保留了集体组织模式,农村基层干部在农民和市场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降低了其中所产生的交易费用。村集体的领导使得村民与村企能够保持有序的互动,并保护了村社在走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权益。

其次,“开放性”关注的是村庄“何以发展”的问题。开放性维度主要强调农村社区在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兼容并包,以开放性的思维吸收外部资源,在打破原有村社共同体的同时重建新的、更大的区域社会认同。折晓叶(2020)在对比各地区经济发达村庄的发展历程时指出,社区经济的发展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开放地方社会边界,吸纳外部社会资源,其中的关键便是引入各类专业性人才。而外来人员进入村庄发展,会使得“陌生人”社会的互动规则出现,村落社会以血缘、地缘、亲缘关系为主的互动模式开始被拟亲缘或业缘互动模式所替代,随之而来的还有村落社会规则、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此同时,村落社会则需要进行重建,即将新加入的外来群体与原村民有效地凝聚起来,塑造新的角色认同,并让各主体在长期的互动实践中形成新的预期,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完成再社会化的历程(毛丹,2009)。而外来群体要融入新的社会环境,其所取得的位置必须获得此环境中社会主流的认可,同时这个新群体也必须认可社会主流对总体社会和其自身的想象(项飙,2018:445)。在内外部群体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新社区的地域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亦会逐渐产生,进而推动扩大化的地域社会共同体的重建。最终,在经济边界和社会边界充分开放的情况下,乡村社区能够持续吸纳外部资源为自身发展提供动力,并获得突破既有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能力。

最后,“普惠性”关注的是村庄发展“为了谁”的问题,突出村社区的发展是以个体的需求为中心,并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黄高智,1990)。在社区经济边界和社会边界开放的情况下,社区内的居民数量及构成都出现了很大变化,所包含的人员不只有村民,还有外来的企业职工、个体经营户、灵活就业的流动群体等。如何让参与到社区建设的各类主体都能够获得发展的收益,成为推动农村社区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在中国的党政体制环境下,基层党组织对于农村社区的发展起到了核心的引领作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追求“普惠性”的共同富裕目标成为农村社区发展的基本目标

导向。在农村社区自发城镇化的转型历程中,“普惠性”目标追求体现了发展中多元主体共建与共享的基本原则,其最终指向的是“人人共建、人人共享”。“普惠性”强调农村社区自发城镇化转型应是包容性增长的历程,以让社区的多元主体都能共享发展成果。总而言之,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乡村社区通过产业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的转型,需要让为社区发展而奋斗的所有主体都能够共享社区发展的成果。只有在发展成果实现“普惠性”分享的情况下,农村社区才能够在自发城镇化的过程中形成多元利益主体间的有效协作,让社区转型获得稳定的社会环境支持。

综上所述,在农村社区自发城镇化的转型历程中,拥有主体性的村集体发挥了重要的组织载体作用,社会开放性的保持是有效融合内外部资源以支持村庄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普惠性则为村庄社会朝着城镇化方向转型确立了基本的目标指向。在突破“城-镇-村”的发展格局过程中,农村社区主体性的发挥使其能够主导发展的方向和收益。同时,在保持独立性的情况下,农村社区通过经济边界与社会边界的充分开放来持续引入外部资源。最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坚持发展成果的普惠性目标导向,实现多元主体的充分参与,让社区实现城镇化转型。总体而言,“主体性”“开放性”“普惠性”均作用于农村社区自发城镇化转型的各个阶段,彼此关联与支持,共同推动社区的发展与转型,为村庄迈向城镇化提供了关键性动力来源,从而构成考察村庄发展形态的重要维度。

结合当前中国乡村发展的差异性表现,我们根据乡村社区“主体性”强弱、“开放性”程度大小、“普惠性”程度高低三个维度的实践情况,将乡村社区的发展类型划分为四种。如表1所示,二、三产业发达的村庄,在“主体性”“开放性”“普惠性”三个维度均有较好的表现,进而获得了自发城镇化的发展机会。本文所考察的永联村便属于这一类型。其他三种类型的乡村社区则由于未能在三个维度方面实现充分的突破,而未能走向自发的城镇化转型。以租赁经济为主的村庄,主要依靠距离市场较近的优势,将村集体的资产向市场出租,赚取租金。在此过程中,村庄的各类资源充分实现了对外开放,但由于村庄发展的主体性较弱,难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租金收益也只限于村集体成员分享,村庄发展收益的普惠性程度较低,难以吸引外部各类人才加入。距离市场相对较远的农业产业发达的村庄,根据地方农业资源占有情况发展区域特色农业产业,提升村民的收入,但村庄仍处于相对封

闭的状态,发展的收益也限于经营农业产业的主体,难以吸引各类市场主体进入,无法带动其他类型产业的发展。产业经济薄弱的村庄在此三个维度均发展欠佳,这类村庄多为空心村,缺乏发展的动力。因此,本文认为,在推动乡村发展的过程中,社区需要在“主体性”“开放性”“普惠性”三个方面共同推进,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乡村社区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基础。

表1 三重维度下乡村社区发展的不同类型

	主体性	开放性	普惠性
二、三产业发达的村庄	强	大	高
租赁经济发达的村庄	弱	大	低
农业产业发达的村庄	强	小	低
产业经济薄弱的村庄	弱	小	低

三、村企关系视角下的永联案例

永联村作为苏南模式的典型代表,自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尝试开办各类村庄工厂,被费孝通誉为“华夏第一钢村”。随着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永联村走出了一条“以工业化牵引,带动城镇化建设,进而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如今的永联已发展成为小城镇的形态,区域面积达到12平方公里,拥有将近3万居民,并形成了占地1000多亩的居民集中居住区——永联小镇,村庄完成了村改居的转型,村民成为新成立的永合社区^①居民,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社会保障待遇。本文根据村企关系的演变形态,将永联村的发展粗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村办企业阶段(1974—1996年)。在村企发展之初,村企高度依赖村庄各类资源的支持,村集体完全把控村企的发展方向。在此阶段,企业的产权全部归属永联村,企业可以获得村集体所有的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支持,从而完成原始积累。

二是企业办村阶段(1997—2012年)。随着村企对村庄资源的依赖性逐步降低和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推进,村企的独立性增强。永联村委会成为村

^① 此社区为永联村两委向张家港市政府申请成立的居民小区,具体情况见下文。

企内的一个部门,直接接受村企的领导,以配合村企去调整和利用村庄的资源。村庄治理也呈现出以企业发展逻辑为主导的经营性治理特性(纪晓岚、朱逸,2013)。

三是村企合作阶段(2013年至今)。2013年后,村集体和永钢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进一步明晰。随着对资产的剥离与调整,永钢集团和村集体之间的关系逐步理清,各自负责不同板块的业务,企业获得了完全自主的发展空间。

四、从“村办企业”到“村办镇”： 村庄主体性与镇域经济形态的打造

村庄的转型与其所处的地域社会发展状况紧密关联,经历了从“村办企业”到“村办镇”的转变,并推动了多元化镇域经济形态的发展。在“村办镇”的过程中,随着区域内经济形态的完善、经营主体多元化特征的出现,村集体及其所创办的村企转变为镇域社会中多元行动主体的一部分。但是,村集体始终掌握着整个镇域内的土地资源、公共财产资源,主导着整个镇域经济形态的打造。

在永联村工业的起飞阶段,村庄刚从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体制中脱离出来,需要为自身发展争取更大、更自由的空间。在这个阶段,村庄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在,积极尝试挣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以村庄内部的资源为基础,“请工业下乡”,并令其成为地方社会的发展极。在1974—1983年间,永联大队创办了10多个工厂,开始推动当地工业经济的发展。在集中村庄所有资源创办永联钢厂后,永联村企的实力快速提升,逐步成为当地的利税大户。如表2所示,永联钢厂^①自1983年成立到1993年这10年间,利税总额由45.21万元上升至3709.99万元,2000年进一步达到15254万元,此后也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成为镇域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此时,村庄处于发展的初期,主要将精力放在社区经济发展上,采取“村办企业”的实践逻辑。村集体和村企则作为区域内最为活跃的行动主体,推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① 1984—1993年其名称为永联轧钢厂,1994年之后改为永钢集团。

表2 1984—2016年永联钢企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年份	资产总额/万元	固定资产/万元	销售收入/万元	利税总额/万元	净利润/万元
1984	—	10.42	123	45.21	36.43
1985	—	47.63	864	105.91	66.68
1986	—	174.61	941	121.31	102.34
1987	—	345.80	1726	204.02	157.38
1988	—	389.91	3498	300.07	184.85
1989	—	692.26	4225	386.91	288.49
1990	—	838.77	2069	220.52	150.58
1991	—	989.15	4457	238.15	153.00
1992	—	1094.29	8816	2314.39	1909.00
1993	—	5062.24	32345	3709.99	2645.00
1994	33471	9970	41955	5481	3494
1995	56659	26560	81205	3144	1830
1996	66948	25707	108945	1705	896
1997	85869	44630	202635	7188	2566
1998	124445	37852	236262	7492	4303
1999	121907	39625	234683	7407	3758
2000	139169	44870	263360	15254	9590
2001	154732	45619	266290	13186	8803
2002	216240	55570	282186	10680	4808
2003	476000	102034	534570	49499	28179
2004	605000	169720	1063262	69058	35828
2005	740000	227640	1278066	95563	59593
2006	949888	333621	1646983	135970	82599
2007	1447507	393942	2465743	224997	131522
2008	1554852	429120	3105033	188686	80215
2009	2043245	449455	2624613	232214	127959
2010	2134026	492342	2846218	157094	84197
2011	2477102	668321	3204415	176924	81871
2012	2632200	769973	3803891	191929	85578
2013	—	—	3550000	18000	—
2014	—	—	3580000	190000	115000
2015	—	—	2580000	130000	—
2016	—	—	3100000	180000	—

注：数据来源于《永联村治》，南京：江苏凤凰出版社，2015：160、207-208、132。其中2014—2016年的数据摘自《奋进的脚步——永钢集团2009—2017年度通讯报告集》，永钢集团出版，2017：199、235、285。

在永联钢铁工业经济发展的同时,永联区域内的服务业亦快速发展,一二三产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融合,推动着镇域经济的全面发展。商贸业方面,2012年,永联区域内有个体工商户152家,餐饮宾馆、酒店、会所等50家,从业人员500余人,营业收入达到3600余万元。2021年,永联区域内已经形成了三条商业街,有300多间门面在经营。旅游业方面,永联的旅游业自2008年开始起步,是年10月,永联村集体成立了旅游发展公司,尝试将永联小镇的建设与旅游业结合,配套建设了农耕文化园、江鲜美食文化展馆、永联特种水产养殖基地以及永钢集团景区。2011年,永联的农耕文化园被江苏省旅游局认定为四星级乡村旅游区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目前,永联的乡村旅游已实现了稳定发展。2020年,永联接待游客100多万人次,营收达1.3亿元。与此同时,永联还尝试发展现代农业,积极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将观光销售、餐饮美食、农场加工制作等环节融合在一起,打造乡村旅游产品,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经过多年的探索,在永联村集体持续推动下,永联区域范围内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经济体量、业态的丰富性已远超一般县、乡水平,在经济业态方面已完全呈现出城镇化的特性。这也意味着,永联村的行动逻辑已经由“村办企业”转变为“村办镇”的实践探索,永联村、村民及其创办的村企则成了小镇的一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村办镇”的实践还表现为以村集体意志为主导来打造整个区域范围内的社会空间形态。永联村集体以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为标准,在村集体资产和永钢集团的支持下,逐步在永联区域范围内修建了柏油路、红绿灯、停车场、医院、学校、菜市场等完备的服务设施,永联逐步成为当地的公共服务中心。由表3可知,永联区域范围内的公共服务设施基本都是由永联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和永钢集团投资建设,并且大多由永联村集体所建立的公司以及合作社来负责管理和经营。而且,在此期间,永联村开始自主拆迁,村民集中上楼居住,完成了由村社区的散居形态到城镇社区的集中居住形态的转变,在物理空间上村庄朝城镇化形态的方向发展。在村集体的主导下,永联村在经济形态、社会空间形态以及社会公共服务配套等方面都已经达到了城镇化的水平。

表3 永联村主要集体资产

名称	投资主体	投资额/万元	建设年份	经营管理主体
永联小学	永钢、永联村	966(初建)	2000	政府
	政府	60(扩建)	2005	
商业街、小吃街	永联村	—	2011	经济合作社
文化活动广场	永钢	5000	2006	永钢
永联戏楼	永联村	300	2010	经济合作社
图书馆	永联村	10	2011	经济合作社
爱心互助街	永联村	400	—	经济合作社
农耕文化园	永钢	5000(初建)	2009	永联文化旅游公司
	永联村	20000(扩建)	2011	
道路、红绿灯	永联村	800	2010	政府
永钢大桥	永钢	6200	2013	

五、从“老”永联到“新”永联： 村庄开放性与镇域社会认同的生成

在村社区内工商业经济发展的历程中,社区面临着如何处理开放与封闭的问题,即既要让外来主体参与社区的发展,又要让社区内原有主体的利益得到保障。而且,农村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这不但使得个体赖以生活的文化价值观念被消解,传统的社会共同体本身也会由于受到深刻影响而处于变动和失序的状态,面临如何继续保持与重建的问题(鲍曼,2012;卢成仁,2015)。共同体的重建并非复兴和回归传统,而是依据社区发展需求,弘扬新的社区文化和意识形态,再组织新社区的生活,重建社区社会认同。

首先是生活空间调整推动传统社区共同体解体。为了更好地支持永钢集团的发展,永联村进行了三次全村范围的建设规划,使得村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1985年,永联村第一次进行规划,实施定点、定线建房的管理办法,将各村民小组住宅统一规划建成了“一”字形。在1993年第二轮村庄建设规划中,永联村又按照工业生产区、生活娱乐区、文化教育区、村民住宅区、商业贸易区和特种养殖场的规划理念对村庄环境进行了大改造。2003年,永联村集体结合永钢集团发展的需求,再次对全村进行了整体规划设计。到2005年年底,因永钢集团拆迁征地,永联的1600户村民开始集中居住,初步形成了小城镇形态。自2006年开始,永联村集体和永钢集团先后投

资35亿元,对永联区域内3000多户人家进行拆迁,集中归并了1000亩土地,按照城镇化、现代化的标准建设了可供2万人居住的永联小镇。然而由于村民进入小镇居住是分批次的,房屋也是以抽签的方式随机分配,村民小组完全被打散,原本的熟人社区形态被打破,村民间的熟悉感、亲密感亦有所减弱^①。村民上楼集中居住的另一重要影响,是导致新一代村民的社会化过程发生了很大变化,其社会关系和社区认同与在村庄聚集居住的老一辈村民产生了极大差异。笔者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年龄在20~30岁的新一代村民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在求学和工作过程中形成,其关系类型已经转变为以拟亲缘、业缘的关系为主。此外,村民所获得的房子都属于商品房性质,可以自由买卖。当前,社区内近四分之一的房子已经售卖给了周边的村民、企业职工以及一些外来创业的个体户。永联村的社会形态逐步由传统的熟人社会转变为类似于城镇社区的陌生人社会。

其次是福利分配模式多样化带来身份边界的模糊化。在工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永联吸纳了大量的、各个层次的外来人员。目前,永钢集团在用工方面已经完全趋向市场化。为吸引更多优秀的专业性人才加入,其提供的工资待遇和社会保障都相当优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外来人员与村民之间的福利保障差距。一方面,为了激发管理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永钢集团分别在1997年和2002年进行了两次股份制改革,两次改革后村集体只保留了25%的股份。永联村老书记曾说,“现在看来,村集体股25%的比例以后可能还会有所变动。因为钢厂员工增加很多,而村民增加很少,两者增幅不成比例……那就不公平、不合理了。为了让企业留住人才,让企业能持续发展,村集体的股份还要缩水,这个比例要慢慢降到10%、8%”^②。另一方面,当前永联区域内的各个企业和单位开始实行年薪制,对于专业性强、能力突出的员工实行年薪制考核,一般的中层员工年薪能达到二三十万元。没有特殊技能的村民则多在基础性的岗位工作,工资在5000~

^① 据永联村的原村民反映,自从进入小区居住后,村民之间的往来大大减少,小组内村民的来往也很少,尤其是近几年,小组基本不开会。虽然红白事仍旧会以原小队为单位进行操办,但参与的人员也更加复杂。而且,现在老一代村民和新一代村民基本上都互不认识。一名曾被誉为“永联活地图”的退休村干部也反映,社区内的很多人她也不认识了,“遇到年轻人,他们只有讲自己的父母是谁,我才能知道是谁家的”(访谈记录YYH20210718)。

^② 转引自高峰等(2018:68-69)。笔者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永联村党委干部亦都认同此思路。

10000元。因此,尽管村民能够获得年底的村集体分红、生活补贴以及房屋分配的福利^①,但外来人员与村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步缩小,甚至有一部分外来人员的收入超过了老村民。同时,永联村村民和企业职工享受同等的医疗保障、教育保障、社会保险以及各方面的社会关爱服务,内外部人员间的福利差别逐步缩小。这也表明,经过长期调整,村庄的社会边界逐步开放,进入新的区域社会边界重构的阶段。

最后是让“永联”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建构镇域社会认同。外来群体要形成对新地域的认同感,既需要获得当地主流文化的认可,又需要适应新的身份角色,按照新的角色规范开展活动(毛丹,2009)。为形成新的镇域社会认同,永联村党委采取了多样化的行动策略促进居民间的融合和营造新的社区文化。其一,在合村的过程中,永联村党委书记坚持让新合并进村的村民享受和原村民同等的福利待遇,直接抹平了新老村民之间的利益差异。其二,永联村党委十分强调对永联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在发展的过程中,永联村党委提出了“进了永联门,就是永联人”的理念,要求在永联区域内工作生活的各类人员都按照区域内的公共规则行动,将自身视为永联的一分子,共同维护和建设永联小镇的社会环境。其三,为了让外来人员对“永联人”这一文化符号产生更深入的理解与认同,近10多年来,永联村党委通过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在社区内部开展了“最美家庭”“最美永联人”“精神文明家庭评选”等各类文化创建活动,并将居民的行为表现直接与居委会、村经济合作社、公司单位、学校、党组织这五个主体的管理关联,组织和发动永联小镇范围内的所有人员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其四,保持开放,吸纳五湖四海的人才进入永联村党委。目前永联村党委的7名委员中只有3名委员是永联的村民,其他4名党委委员都是外来人员,分别管理经济合作社、社会组织以及其他方面的重要事务。一名主要负责永联社会组织事务管理的外来党委委员说,“虽然我的户口不在永联,但我觉得我就是永联人,我就是永联的一分子”(访谈记录CH20210720)。通过各种形式建构外来人员“永联人”的文化身份符号,本质上是将“永联人”的概念和所指范畴进行重塑,将以村户籍和

^① 据了解,目前永联村的村民每人每年实际能获得的分红在10000元左右,这相当于出租土地的租金。生活补贴方面,永联村的村民每人每月可以获得600元的菜金补贴,退休的村民每月会额外获得1000元的养老金。永联小镇的房价近两年稳定在6000~7000元/平方米。

村庄土地边界为标准判定的“老”永联,转变为容纳了外来人员和涵盖更大地理区域范围的“新”永联。这也推动了社区内“公”与“私”之间的边界与内涵发生变化(赵晓峰,2013)。

六、从村庄治理到镇域治理： 普惠性发展与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

由上文的论述可知,村集体主导打造的镇域经济所创造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带动了各类群体的收入提升和生活水平提高。同时,村庄通过保持高度的开放性和制定多种福利分配制度,让各类群体在社会文化、精神需求层面都获得了充分的认可。这些实践体现了村庄发展的“普惠性”导向,亦直接或间接地证明了“以人为本”在乡村社会转型中的内在客观需求。村庄发展过程中之所以坚持“普惠性”导向,一方面是为了吸纳外部资源以促进社区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明确发展“为了谁”的目标,即社区的发展不仅是为原村社区的村民谋福利,还要让参加到社区发展的所有人都获益。

笔者在对永联区域内的社会治理转型历程进行梳理后发现,在永联村党委的支持下,永联村构建了多元主体共治的镇域社会治理格局,让在永联小镇发展的群众都能够享受高质量的社会服务与良好的社区生活环境。

其一,突破公共事务治理合法化困境,推动乡村两级合作共治。上文提到,永联在“村办镇”的过程中以城镇社区为标准,在永联小镇内部配备了相当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和服务项目。然而,在实际的运营和管理过程中,由于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和永钢集团缺乏合法的治理权,社区公共环境维护成本极高。此类问题在2009年之前表现得相当突出,主要包括:第一,公共设施的运营管理问题突出。永联村在社区范围内修建好了红绿灯、停车场等公共设施,但是永联小镇的工作人员没有执法权,无法处罚违规者。第二,社区公共管理事务远超出村民自治组织的治理权限。例如区域内农贸市场、商场、饭店等场所的公共环境、卫生安全以及安全防火等,永联村无权、无专业能力进行治理。第三,永联小镇内居民和组织的复杂化导致的治理难题。永联村集体和村企只拥有管理村民和企业员工的权力,难以对外来的个体工商户、流动打工群体进行有效管理,导致永联小镇范围内长期存在黄赌毒、打架斗殴的治理难题。为此,永联村党委积极向乡镇政府和张家港市政府寻求帮助,探索乡村

两级的合作共治,让乡镇政府的相关机构进驻到永联小镇。2009年,张家港市政府牵头组织,最终决定以建立社会事务协调办的形式将永联小镇治理所需的交通、卫监、工商、公安、城管等相关部门人员派驻到永联小镇,并建立协调领导小组对协调办的常态化工作进行管理。自此,永联村党委通过自下而上的“逆推动”,实现了乡村两级治理主体间的合作共治,初步解决了整个区域的正规化管理与运营问题。

其二,进一步激活基层社区自治功能,让多元化的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早在2009年,永联小镇区域内便形成了“三个一万”的人口结构形态。而永联村委会仅能代表永联村民进行自治,其他的社区居民难以获得自治权,其自治的能力和意识都有待激发。为此,永联村党委便向张家港市政府申请在永联小镇内设立居民小区,尝试实行社区化的管理与服务。2011年经张家港市人民政府批准,永联小镇成立了“永合社区”,对社区内的两万多人进行统一管辖,构建新的基层治理单元。在永合社区成立后,为进一步明确各主体之间的职责,2013年经过上级政府部门的批准,永联村党委将永联村村民的基层民主自治权力移交至永合社区,永联村委会则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的名义存在,主要负责社区经济事务的管理。

其三,积极孵化社会组织、社会团体,进行精细化治理。永联小镇内治理事务繁杂,仅依靠社区居委会、协调办的力量难以实现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供给。为此,永联村利用村集体资金,根据不同时期社区治理的需要,孵化各类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目前永联小镇已经成立了永联为民基金会、张家港惠邻社工服务中心、张家港市永联惠民服务中心、永联志愿者联合会、永联社会文明建设联合会等多家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这些社会组织在永联村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分工合作,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公共服务,让社区内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同时,永联村还尝试推进居民自治组织的建设,在永联小镇区域构建了“居民代表大会议大事、能人议事团体议难事、居民楼道小组议琐事”三级议事平台,以及“媒体平台议丑事”监督平台,实现了社区居民对社会治理事务的充分参与。

其四,分立三个党委组织,构建多元主体共治格局。随着永钢集团和永联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之间的利益关联逐步明晰化,永钢集团越发独立于村集体而发展。2019年,在永联村党委的支持下,永钢集团的党支部升级为党委,与永联村党委成为平级的党组织,永联村党委书记兼任永钢集团党支部的副书

记。这意味着永钢集团获得了充分的自主权,钢企股东及员工的利益得到充分的认可。2020年,永合社区党支部也从永联村党委内独立出来,成立社区党委,成为与村党委、永钢集团党委同级的党委组织。由此,在党政层面正式确认了永合社区的独立性。自此,在永联小镇的区域范围内拥有了三个独立的党委组织,分别对社区内不同群体进行组织领导,推动了多元主体共治格局的形成,使得在永联区域内发展的多元主体的利益都得到了保障。

基于以上分析可见,如表4所示,与折晓叶团队所言的亦城亦乡的、不稳定的社区“中间形态”不同,永联村经过近40年的内生式发展,在居民身份、人口构成、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以及治理方式等方面都实现了城镇化转型。其通过社区主体性的充分发挥,走出了一条由乡村自发力量推动的城镇化转型道路。

表4 超级村庄由乡到城转型的主要指标对比

社区形态	居民身份	人口构成	产业结构	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社会关系	治理方式
乡-城“中间形态”	农村户口	村籍人口为主	一、二产业兼顾	工农结合	传统、现代结合	熟人关系为主	村组治理模式为主
城镇形态	城市户口	构成多元化	二、三产业占据主导	非农就业	都市生活	陌生关系为主	居委会、市场化购买服务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对永联村转型发展历程进行接续研究,以“主体性-开放性-普惠性”三位一体的内源式发展框架为切入口,考察农村社区如何顺利实现自发城镇化转型,并尝试解释其中的缘由,探讨中国城镇化转型道路的内在特性。首先,以“主体性”为视角考察乡村社区发展转型的载体如何运作的问题。通过考察永联由“村办企业”到“村办镇”的转型历程,发现此类乡村社区通过发挥村集体的主体性,将内外部资源进行充分融合,推动了乡村工业经济的起飞和镇域经济的发展。其次,从“开放性”的角度讨论社区何以发展的问题。乡村社区在经济边界开放的过程中,社会边界亦走向了开放,通过社区内福利分配方式的多元化、社会关系的业缘化转型和新区域文化符号建构,推动着新社区社会文化符号认同的生成。再次,在“普惠性”的视角下探讨“为了谁”而发展的问题。在“普惠性”的目标导向下,为了回应多元主体的利

益诉求,村庄社会的治理转型升级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镇域治理形态。最后,需要指明的是,乡村社区在经济层面、社会文化认同层面以及治理层面共同实现城镇化转型的过程中,“主体性”“开放性”“普惠性”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分别体现于社区不同的发展阶段,共同保障了乡村社区自发城镇化转型的实现。“主体性-开放性-普惠性”的分析框架,强调乡村社会中的农村集体制度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以及政治因素对其转型发展的影响,也体现了中国乡村存在着城镇化转型的内在动力和可能性。这对于理解和探讨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和发展经验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当前,学界从不同角度关注中国向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毛丹(2010)将城市比作大岛,将乡村比作无数的小岛,将二者的间隔比喻成海,主张在二者间建立起桥梁,建立城乡经济与城乡社会的衔接带,使二者能够快速、便捷地互动。还有学者则提出,村民实现市民化转变的历程与物理空间、经济形态的城镇化转型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推动中国城镇化发展要将更多关注点落脚于村民个体市民化转型上(文军、吴越菲,2017)。此外,中国一直保持着乡土社会的底色,中国城镇化的转型道路也受到乡土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的城镇化应当走扎根于乡土中国的发展道路(卢晖临,2019;卢晖临、粟后发,2021)。以上研究都集中回应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与经验的问题,主张走出“城乡二元”对立的预设,以城乡共同发展来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这与本文所阐释的中国农村社区经过长时期的经济发展实现了自发城镇化转型的经验相符。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城乡相辅相成,仅仅依靠城市社会的发展,难以推动我国如此大规模人口的城镇化转型。中国的城镇化要实现稳定发展,还需要关注乡村社会自身的发展动力,重新审视那些拥有内生发展动力的超级村庄的转型经验,让我国的现代化转型拥有更强的社会韧性和更大的可调控空间。

当年费孝通先生提出“小城镇 大问题”的核心关怀是如何让中国在庞大的小农人口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转型(沈关宝,2014)。在中国城镇化转型的历程中,如何实现稳态的转型是当前需要着重讨论的议题。本文所研究的永联村,其实现自发城镇化转型经历了40多年的时间,相对于行政与市场力量相结合推动的城镇化进程更缓慢。而与外源力量推动的摧枯拉朽式的城镇化转型相比,乡村社会自发推动的城镇化呈现出更强的社会稳定性,农民在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可以得到更好的回应,并且由于有村集体经济的保障,农

民进行市民化转变的风险相对较低。此外,在村集体主导下,农村社区的开放历程是循序渐进的,社区内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跟随社区发展的需求而逐步演化,农民赖以生活的文化价值观念并未崩塌,传统与现代间的张力带来的精神世界冲击感和撕裂感也得以减轻。可见,乡村自发城镇化的步伐更为稳健,这为推动中国城镇化的稳态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支持。

最后,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本文所提出的农村自发城镇化转型议题,基本指向那些有强有力的村庄精英引领、长期坚持内源式发展,且有着强大经济基础的超级村庄。这些条件是乡村社会实现自发城镇化转型的基本前提。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存在一定数量的超级村庄,中西部地区也有少量此类村庄。可见,农村社区通过内源式发展的探索实践走向自发城镇化的现象并非个例。本文以永联村的自发城镇化转型历程进行的实证分析,对于探讨中国特色的多元城镇化发展道路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参考文献:

- 鲍曼,齐格蒙特,2012,《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戴慕珍,2021,《中国乡村起飞: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李伟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迪马吉奥,保罗,1988/2008,《制度理论中的利益与行动者》,张永宏主编《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梁锦文、廖嘉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冯仕政,2007,《国家、市场与制度变迁——1981—2000年南街村的集体化与政治化》,《社会学研究》第2期。
- ,2009,《国家政治文化变迁与农村社区制度选择——南街村案例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费孝通,1984,《小城镇大问题——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论文选》第1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高峰、马德峰、王俊敏,2018,《一个苏南乡村的治理之道——张家港永联村调查》,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 鹤见和子,1989,《“内发型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胡天民译,《江苏社联通讯》第3期。
- 贺雪峰,2013,《新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黄高智,1990,《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发展概念》,阿卜杜勒·马利克等主编《发展的新战略》,杜越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黄宗智,2000,《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
- 纪晓岚、朱逸,2013,《经营性治理:新集体化时代的村庄治理模式及其自在逻辑》,《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科斯,罗纳德·H.,2014,《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陈昕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 李路路、李汉林,2019,《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与交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 李强、陈宇琳、刘精明,2012,《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
- 卢成仁,2015,《流动中村落共同体何以维系——一个中缅边境村落的流动与互惠行为研究》,《社会学研究》第1期。

- 卢晖临,2019,《村庄的未来——来自田野的观察和思考》,《学海》第1期。
- 卢晖临、栗后发,2021,《迈向扎根的城镇化——以浏阳为个案》,《开放时代》第4期。
- 陆文荣、卢汉龙,2013,《部门下乡、资本下乡与农户再合作——基于村社自主性的视角》,《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
- 陆益龙,2017,《后乡土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
- 毛丹,2009,《赋权、互动与认同:角色视角中的城郊农民市民化问题》,《社会学研究》第4期。
- ,2010,《村落共同体的当代命运:四个观察维度》,《社会学研究》第1期。
- 潘维,2003,《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北京:商务印书馆。
- 沈关宝,2014,《“小城镇 大问题”与当前的城镇化发展》,《社会学研究》第1期。
- 王德福,2017,《弹性城市化与接力式进城——理解中国特色城市化模式及其社会机制的一个视角》,《社会科学》第3期。
- 王颖,1994,《社会转型的层级结构分析》,陆学艺、景天魁主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威廉姆森,奥利弗·E.,2001,《治理机制》,王健、方世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文军、吴越菲,2017,《流失“村民”的村落:传统村落的转型及其乡村性反思——基于15个典型村落的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温铁军等,2011,《解读苏南》,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 温铁军、董筱丹,2010,《村社理性:破解“三农”与“三治”困境的一个新视角》,《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4期。
- 夏柱智、贺雪峰,2017,《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 项飙,2018,《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 熊万胜,2010,《基层自主性何以可能——关于乡村集体企业兴衰现象的制度分析》,《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张环宙、黄超超、周永广,2007,《内生式发展模式研究综述》,《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
- 赵晓峰,2013,《公私定律:村庄视域中的国家政权建设》,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折晓叶,1994,《社会转型的结构性要素分析》,陆学艺、景天魁主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1996,《村庄边界的多元化——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的冲突与共生》,《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2020,《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
- 折晓叶、陈婴婴,1997,《超级村庄的基本特征及“中间”形态》,《社会学研究》第6期。
- ,2000,《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发展历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2005,《产权怎样界定》,《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周飞舟、王绍琛,2015,《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Christopher, Ray. 2012. *Culture Economies, Centre for Rural Economy*. Newcastle University, Newcastle, England, Research Report.
- Little J. & Austin P. 1996. "Women and the Rural Idyll."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2(2).
- Nerfin, M. 1977. *Another Development: Approaches and Strategies*. Uppsala: Dag Hammarskjöld Foundation.
- Oi, Jean. 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1).
- Ward Neil, P. Lowe & J. Murdoch. 1995. "Beyond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Models: Networks in Rural Development." *Agricultura Y Sociedad* 33.

Walder, Andrew. 1995.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2).

The Change of Super Village and the Practice of Rural Spontaneous Urbanization

ZHAO Xiao-feng CHU Qing-yi

Abstract: The steady progr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ransformation in rural areas is a key link to realize Chinese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Yonglian Village as an example, examines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spontaneous urbaniza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ubjectivity",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and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practical logic of super villages moving towards steady-state urbaniz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spontaneous urbaniza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the village collective with subjectivit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s an organizational carrier. The openness of village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pursuit of inclusivenes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has established a goal guid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villages towards urbanization.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form, social culture, social governance and other aspects, the village has gradually broken through the "core-periphery" gradient development model with the town as the development center in the "city-town-village" pattern. Farmers have lived a life of urbanization, walked out of a spontaneou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path, and enriched the realization form of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Keywords: super village, autonomous development, openness, inclusiveness, spontaneous urbanization

(责任编辑: 骆骁)